

边境地带共匪从苏联得到某些子弹物资的事实是确凿的。但是目前在量的方面说，恐怕是微不足道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下各点。

- 一、远东军和匪团的紧密联系；
- 二、苏联官宪通过一切机会向匪团表示友谊的援助——掩护逃亡，治疗伤员、政治的军事的教育和指示；
- 三、通过这些工作在匪团中扩大和增强影响，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如发生日苏战争的时候），远东军作战时能够动员和控制匪团。

第十章 共匪的活动方法

第一节 情报联络技术

匪团情报网的基础是在反日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工人工会等群众团体之中。因为这些群众团体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情报网，共产党和武装队就经常通过它来收集必要的情报。

其它武装匪团为了使作战行动准确和周密，则设有自己的专门情报部门，使用密探搜集情报。

在共匪的正规军中，上级部队和下级部队多少有些不同，但通常是把这种专职部、侦探队同其它交通队（联络）、慰问队（洗衣、缝纫、文娱等）、运输队、伙夫队（炊事）、传令队等全部置于政治委员领导之下。当然，原则上是这样，根据条件的不同，也可以简化，但有一点必须注意，作为红军中党代表的政治委员是它的核心。

对于满洲共匪这一方面的调查研究还不够充分，而且也缺乏弄清这一问题的资料。但据说：

“共匪串山甲部下的梁一山，积极从事购买物资和搜集各种情报。”

情报搜集方法——积极地接近日满军警、鲜满人翻译和密探，除秘密侦查讨

伐出动的时间、地点、兵力外，还出入小饭馆和大烟馆，搜集各种情报。

在出入市内时，因单独活动比较危险，所以同熟人或者同朝鲜人一起活动。

因为投宿在旅馆和满人住宅，会经常遭到官宪的严密监视和频繁的检查，所以绝对不能住宿。相反，由于朝鲜人家受到的监视较松，因此，一般在朝鲜人家住宿。

而且，这种侦探队，多以妇女、小孩、老年人等组成。

设专职交通员担任匪团间的联络事宜，保守秘密，防止官方发现，确保安全。满洲省委为了同下级党部以及同共产国际海参崴派出机关联系，设有专门机构——交通局，这是很著名的。但是，不仅仅是满洲省委设置了交通员，其下级党部以及武装集团，也同样设有交通员。这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联系，原则上不利用满洲国的通信机关，而是建立自己的交通系统，尽可能以口头传送情报。

“匪贼间的联络，经常是使用密探（交通员）来担当此项工作，密探原则上不变动。这些密探伪装成商人或农民，白天阔步行走在大路上，穿过搜查网。”（匪首平东部下安永贵供述，昭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

“康德二年八月初，我（周保中的联络交通主任王显文）同周保中在宁安县二道河子时，他说：‘你去牡丹江物色一所适当的房子，为了避免官宪的注意，可以做生意为掩护，建立第五军中央交通站，你做负责人，通过你保持我和穆稜的胡仁之间的联系，而且要帮助胡仁开展工作’。于是，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来到牡丹江，租了一间合适的房间，表面上装作卖香烟或杂货的商人。”

联络技术更是谨慎周密的。

“联络都是使用暗号或者暗语来进行，尽量避免使用书信联络，主要是用口头传达。在不得不使用书信时，为了避免暴露其内容，首先在正面写成普通的书信，在背面用米汤写上联络的文字，发信和收信人全用假名，寄到邮局待领。收信人接到信件后，在信的背面涂上碘酒（酒的一种，在满人药店出售），则清晰地呈现茶褐色的文字。在达到目的之后，即行烧掉。”（密山抗日会李明学供述，昭和十年十一月七日，滨江省公署警务厅）

“各革命军进行联络或通报其他重要事项时，使用洋纸，加高温烘烤后即可出现文字。

“还有，李学万部队白天的联络方法是使用宽五尺，长二尺五寸的红旗，挂在三尺左右的竿上，左右摇摆数次，证明是自己的部队。其他方面，则派遣密探进行联络。各部队的密探以及其他联络员，在背包中有牙刷，以证明是自己人。”（饶河县委王可文供述，昭和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三江省公署警务厅）

“匪贼的保密工作，较之军队，尤为严格，如有违犯，不问部队内外，一律处以枪决。在一般情况下，利用下级匪徒和农民担任联络工作，或者是在一定的场所做一个他人不易识别的暗号。这一作法，需要事先商定，而且只限于一部分固定内容。”（第三军宣传部长刘世武供述，昭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三江省公署警务厅。）

“匪首之间大多依靠当地居民进行联络，不分男女老幼。利用鸡毛信进行联络，以鸡毛的多寡区别紧急的程度，一根表示普通，二根表示急，三根表示特急。”（共匪长海部下金仁锡供述，昭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三江省公署警务厅）

“问：你们在与同志联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暗号？”

答：地方工作人员好像是有暗号，但像我这样军队方面的人则没有必要使用暗号。

问：重要的联络信件怎样携带？

答：我藏在鞋底里边。”（王显文供述）

“勃利县反日总会朴某告诉我：‘你化名李玉住在牡丹江的福泰栈，在门前容易看到的地方做一个暗号，这样就有一个姓赵的来找你，你可以同他谈话。’于是我就去牡丹江，买了一支粉笔，按上述办法做了之后，第二天赵某就找来了。”（第四军军需主任罗英供述）

其次，关于同驻苏联机关的联络是由设在哈尔滨的满洲省委交通局和设在宁安的绥宁交通局担当，据说用下述办法进行。

“宁安绥宁交通局领导下的对苏联联络网，在绥芬河设中心交通站，管理自

饶河至珲春间苏满国境的各交通站；自绥芬河向北到饶河之间设三站，称北三站；由绥芬河向南至珲春间设四站，称南四站。在这些交通站的对面，苏联方面也设有交通站，双方每月各越境联络一次。但珲春交通站，约在二个月前由于中共方面交通员迁居，该组织已不存在。饶河站也在三、四个月前，由于苏联方面的交通站发生了问题，而断绝了交通。

“最近，由于满洲方面加强了国境警备，其他交通站的联络，也都处于停顿状态。现在，顺利地开展工作的只有东宁站，在九一八纪念日以前，这个交通局还接收了交来的党的活动经费。”（第四军管区司令部顾问部，昭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另外，据第三军宣传部长刘世武供称，党员去苏联的方法如下：

“在帽儿山同赵尚志会谈时，赵曾告诉我：‘关于去苏联，可乘火车至绥芬河，然后由绥芬河沿铁路至国境。遇第一线岗哨则告诉他是为了做工而入境被送到第二线步哨时，则可出示我告诉你的暗号’。

“康德元年旧历五月四日，由乌吉密河站出发，第二天到达绥芬河，沿铁路前进，在东部山中住一夜。五月七日，越过了离国境很近的一条小河。再向前走一小时以后，被苏联第一线岗哨的边防营所逮捕，拘留一夜，经一定的盘问之后，乃被允许入境做工。由二名苏联士兵护送，经两小时到达第二线岗哨（四站）。在该地通过中国人翻译，询问了入境的目的、姓名、年龄等，并回答他说：‘我是赵尚志部下，这一次是去苏联留学并从事考察工作，年龄四十二岁。’他们说：‘如果是这样，就请你出示赵给你的暗号’，我则回答：‘锤子三十五号’，他们认为这就可以了，不必再谈其他事情。于中午在一名士兵陪同下，向右方步行四小时，便被送到海参崴。

“在黑夜中已不易判断，好象是收容在一所很漂亮的三层楼房的拘留所里，绝对禁止同他人谈话。第二天，除衣服、帽子、鞋等外，还发给去莫斯科的车票、现金二百卢布以及若干水果，同响导一起登车。中途没有下车，于十三日到达莫斯科。在车站，有一位招呼我名字的响导迎接我，乘汽车通过车站右侧的大街，约二十分钟被送到了似乎是普通民宅的四层楼房中。”（昭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三江省公署警务厅）

第二节 游击队战斗纲要

游击队的战斗原则有三：

- 一、坚决的进攻精神；
- 二、袭击敌人的弱点；
- 三、秘密的准备和迅速的行动。

这三项原则是在当地群众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根据部队的活动情况，或“化整为零”（分散主义），“或化零为整”（集中主义），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那种可以袭击的弱点呢？现在仅就兵力和装备的情况做些分析。

弱点大体上可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客观的原因，一是主观的原因。

所谓客观的原因，即由部队周围情况的变化而构成的弱点。具体来说：

- 一、抢先占领山地、森林、房屋，以此为据点截击敌人。

“在敌人行军时，游击队事先埋伏在敌人通过的险路上，敌人来到时就突然进行攻击，使敌人来不及应战。”（《游击运动问题》）

“除特殊情况外，游击队的行动一定要比日满军队快，情报也快，如果形势不利，即行退却。但如果了解到对在峡谷间行军的日本军可以进行一次有利的战斗时，在确切掌握了它的路线和时间之后，利用山谷，把日军引入绝境，设伏兵，在前面开始射击，当日军企图后退时，由两侧高地或后方同时开火。

（第三军刘世武供述）

“由于日军主要是通过峡谷，因而采取在山上攻击的方针。其次，如果在平原，则选择密林作为通路。因为，这样可以躲避飞机，而且在森林中进行战斗，同日军相比，处于优势。”（第五军炮头长坏山供述）

这可以说是自然发生的截击，与此相对的，还有诱导的截击。

“在山地交战时，兵力如无大的悬殊，日军肯定要进攻。因此首先让自己

部队占领下一个后方高地，正面部队则佯装下山退却，使尚有余力的匪队从一个高地进行射击。”（刘世武供述）

本来，山地、森林、居民区、河川等地的战斗属于“特殊地形的战斗”，大部队作战极为困难，对轻装敏捷并熟悉地形的游击队来说，最为有利。

请看居民点截击一例：

“十一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三十分，机关枪连由莲江口出发，途中进行警戒搜索，于上午十时三十分到达汤原县楼上部落。

“在尖兵进入楼上部落前，曾询问路旁的农民和邮递员有无匪情，他们都回答说没有匪情。

“而且，该村的儿童正在屋外赶猪，农民正在庭院前边打谷，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情况。因此判断没有匪情而进入该村。

“楼上部落是一个很大的村落，它有三个屯子。在尖兵来到村落最西边的屯子附近时，遭到高楼上的猛烈射击。当连长得知已陷于匪之重围时，随即命令在道路两侧的泥土中散开，进行战斗。这时才弄明白，在院子前边打谷的农民以及行人等全都是匪贼。

“匪贼逐渐缩小包围圈，步兵匪在前面，骑兵匪包抄后路。交战约三小时，机关枪班长当场被打死，排、班、连长等负重伤，终于束手无策，不得被解除武装。”

在这样情况下，游击队同当地居民的密切关系（这是游击队的生命线）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由于客观原因而产生弱点的第二种情况，是乘大客车或卡车行进。这种机动力量，在平原地区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这种有利条件，在游击队面前，却往往作为弱点而暴露出来。

“在山路，对卡车进行袭击是很容易的。”（刘世武）“对乘大客车和卡车的部队，利用使之陷入河川或沟里，再进行奇袭的策略。”（长坏山）

其次，再研究一下由于主观的原因而产生的弱点。

这种情况主要构成游击队奇袭的根据，与之相对的是由于客观的原因而发生的截击战。

- 一、夜间睡眠时；
- 二、吃饭休息时；
- 三、通匪者的策谋；
- 四、欺骗奇袭。

大体有上述四种情况。

夜间奇袭——“对于行军途中讨伐的日军尽可能在夜间对它进行出其不意的挟击，对大部队则避免在白天进行战斗。”（长坏山供述）

“敌人在某地宿营时，游击队以群众为疑兵（在各地呐喊、放火等）利用熟悉的地形，迅速袭击其侧翼。首先杀死哨兵，然后果断地进行攻击，纵令不能给敌人以严重打击，也可以扰乱敌人的宿营，疲劳敌人，削弱其战斗力。”

（《游击运动问题》）

吃饭休息时的袭击——“在敌人到达宿营地或在行军途中休息时，趁敌部队混乱，或寻找饮食时，迅速进行袭击，敌人必定陷于狼狈状态而失去指挥能力。因此，如果击溃其一部，则可对其残部进行追击而歼灭之。”（同上）

通匪者的策谋、欺骗奇袭——满军、治安队、自卫团，都经常遇到上述两种情况。

“利用日伪军的标志服装进行欺骗，使之陷于绝境，或者进行牵制。还有，对偏僻地区的自卫队，诈称满军，骗开大门闯入。”（刘世武供述）

这可以说是谋略的奇袭战，与此相对，前者可以说是自然的奇袭战。这一区别，与截击战分为诱导的截击战和自然发生的截击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这四种情况，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单独出现一种的，而是以交错、互相结合的形式出现的。例如：

“康德二年末，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长夏云阶，曾多次要求矿山镇商会、鹤立岗煤矿事务所交出财物和人质费，由于没有得到答复而非常气愤。为了报复，企图袭击矿山镇。收买了煤矿事务所次长金井建吉的佣人施德九，并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从内部调查了警戒情况，多方联系，伺机袭击。据情报得知，四月十三日中午，匪团约一百人集结在矿山镇南方铁路沿线，约二百人集结在西方约五十华里处，准备袭击矿山镇，但袭击事件并未发生。四月二十日

夜十一时三十分，突然遭受三百名步兵匪从北方高地发起的袭击，同时，市街南八华里的货车也遭到七十余名骑兵匪的袭击。

“夏云阶亲自指挥主力部队——三百余名步兵匪，趁黑夜，以烽火为信号，突然从部落北约二公里半的石灰山高地开始袭击，其中半数（轻机二挺）袭击日本兵营，其余半数同时向煤矿事务所开火。而且通匪者施德九及其家属剪断了事务所和干部宿舍周围的铁丝网，打开各门锁，悄悄地拿走了金井次长的步枪，绑架了哨兵，为匪团的侵入提供了方便条件。但由于日军迅速应战，掌握了主动权。另一方面，由于事务所供夜间警备用的探照灯使他们丧失了行动自由，从而陷于惊慌失措，再加上日军的猛烈射击，交战两小时后退却。

造成这次袭击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点：

- 1、通匪者的活动。
- 2、佯装于十三日中午进行袭击，而突然在二十日晚十一时半进行。
- 3、袭击货物列车，牵制了支援部队。

“康德三年三月六日晚八时五十分，勃利县青山河口森林警察队本部遭到约二百名李延禄、王荫武联合匪的袭击。其经过如下：

“森林警察队进山后，正值在大青山盘踞的白龙匪于十二月十七日向驻勃宪兵队归顺。森林警察队千叶指导官通过宪兵队长的介绍，希望得到归顺匪中骨干分子的协助，并为之充当密探，因而当时派其中四人进山。

“当初，他们都很忠实地服从该指导官以及队员的命令，在森林警备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而，近来有秘密谋反的倾向。千叶警佐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正在考虑处置他们。在事件发生前二日，在队内执行勤务的两个人提出要外出侦察，于是二人都走了。在二天后的六日傍晚又突然回来了。

“陈队长很怀疑他们的行动，对他们回来这么晚大加申斥。二人沉默片刻就跑到室外去了。他们跑出去约二小时后，即在晚八时五十分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返回本部，好象要报告什么似的接近了陈队长。突然掏出手枪射击，陈队长当即被打死。这时，匪团已将本部包围，听到这一枪声，一齐向本部开始猛烈的射击。”（勃利县公署警务局，昭和十年三月十日）

这种情况即是通过通匪者的策划而发生的袭击。

“康德三年四月四日上午一点四十分，匪首不明的匪团（据说是李华堂匪）约二百名，突然侵入依兰县城内，袭击了依兰地区警备司令部、弹药库和南大营。

“该匪团曾在四月二日晚十一时左右转移到依兰县城南方三十华里的苏联国境附近，似乎企图袭击地区司令部的弹药库。当时地区司令部所属部队大部分在管区外讨伐，留守部队除日本军官外，仅有李司令官领导下的三十余人担任警卫。

“四月四日上午一时四十分，该匪团接近县城西南门以南约五百米处，突然向满军机关枪连警卫的县城西南门隅炮台和南大营进行奇袭，连长以下约二十人虽努力奋战，但寡不敌众，连长以下死伤三人，毙匪两人。匪团越过城墙，攻击地区司令部的大门和后门，巧妙地利用牵制掩护射击，其中一部约五十人乘隙攻到弹药库，守卫该弹药库的十名卫兵有三名被打死，同时打死夫役两人，夺走了卫兵长携带的钥匙，打开弹药库门，抢走迫击炮二门，重机枪二挺（由于日军的追击，这些又被遗弃）、三八式步枪约百支、子弹五万发等，装在事先准备的四台马车上，于上午三时左右出西门向城外西南方逃去。”

发生这次袭击的主要原因如下：

- 1、警备力量薄弱；
- 2、上午一时四十分开始的夜间袭击。

这样，不论在上述何种情况下，都充分地体现了游击队的战斗原则。即“秘密的准备和迅速的行动”、“对敌之弱点果断进行攻击。”

“七月五日晚十一时，第三军所属郝贵林匪二百余名从南方转移到勃利县第二保偏脸子一带，欺骗当地保甲所说：‘我们是日军和驻密山县哈达河的治安队。我们是到这里讨伐来了。’要求开门进行盘问和搜查。于是强行闯入，绑架甲长等三十八名，抢走了马二十一匹、西装四套、自卫团服二十套。”

（昭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勃利县公署警务局）

“明山、天元、占山好等共匪系统联合匪约一百三十名，在依兰县松木河边劫到由佳木斯开往依兰县太平镇的一辆旅客汽车。约二十名匪徒乘坐该车，于下午五时左右到达大碛屯自卫团办公室。下车后对团员说：‘我们是从三江

省公署来的。’说话是通过一个似乎是朝鲜人的翻译进行的。有的人还扮成警务指导官。自卫团员误认为这是真正的工作队，按他们的要求，给他们看了已有的枪械帐簿。于是他们又说：‘在你们附近有很多的匪贼，你们为什么不讨伐？！如不讨伐，工作班要收回武器！’就这样骗取了枪枝弹药。然后又说：‘你们虽处在自卫团的地位，但穿着与身份不相称的服装’，要求交换服装。这时才开始发现他们是土匪，但为时已晚。突然，匪团的态度一变，架起二挺机枪，抢走了被服和其他物品，用汽车拉到张家烧锅。然后骑上事先准备好的马匹，向东方桦川县境内行进。”（昭和十一年一月十日，三江省公署警务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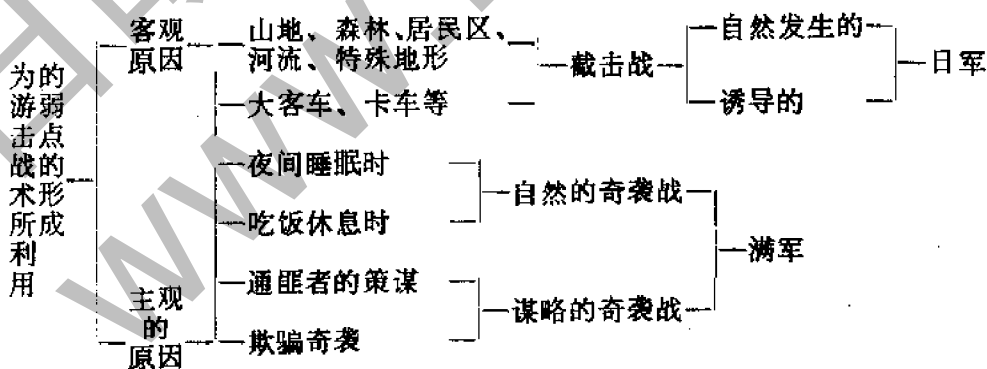
还有

“六月三十日上午三时，匪首中侠部下约五十名突然袭击了绥滨县第六区福兴屯警察署。其中二名伪装便衣报告匪情，欺骗哨兵使之开了门，突然掏出手枪。与此同时，潜伏在七十米左右前方村内的匪团一举闯入。该署署员虽奋起应战，但因众寡不敌而被解除武装。”（昭和十一年七月一日，绥滨县公署警务局）

上述事例都属于典型的欺骗奇袭战。

上述各种关系如果以表示之，则如下表。

比较而言，日军由于客观的原因而产生的弱点较多，由于主观的原因而产生的弱点在满军方面则比较明显。后者自不待言，至于前者，恐怕是自恃装备、训练、素质的优良，因而缺乏对客观条件的周密考虑所致。



共产国际在《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件》中，关于游击战术曾指示如下：

“敌人经常以大量兵力对各地进行讨伐，我们站在反讨伐的立场上，极需注意下列事项：

1、尽量避免同敌人强大兵力发生正面冲突，以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敌之弱点即敌之后方或侧翼，以利于削弱敌人的斗志。如集中全部游击队的兵力，由正面攻击敌人，则不仅会带来极大的危险，而且为害不少。因此，应运用1934年春季磐石的经验，在敌人包围以前，脱离敌人的包围圈，积极进攻敌人的弱点。

2、在广大地区组织民众武装团体，扰乱敌人阵地，破坏敌人交通网，断绝敌人的粮道。

3、各地游击队要经常互相配合，以牵制敌人的行动。

4、在斗争期间，要经常注意培养和扩充游击队的实力，空喊‘不许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等口号，损失实力去固守根据地，这是最愚蠢的。同时这种作法，在客观上，有可能为敌人消灭游击队提供方便。

如果你们为了避开强大敌人的进攻，暂时离开现在的阵地，这种行为决不是退却。而为了固守阵地丧失生命，这才是下策。”

在游击战的战斗中，一般说来，其战术的目的同样在于“压倒并歼灭敌人，迅速取得胜利”。但其战略的目的却不同，它在于“使敌人丧失斗志”。这是因为“现在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时刻，而是动员群众的准备时期，同时也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内部工作时期。”（同上）

因为游击战斗是选择敌人的弱点而进行的奇袭战，虽然每个战斗都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取得全面地压倒并歼灭敌人的胜利。胜利经常是局部的。然而，却可以全面的瓦解敌人的士气。还可以开展群众工作，逐渐加强和扩大武装队伍。而待一定的政治、军事条件成熟时，则转入全面的进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胜利地夺取政权。这也可以说，游击战争就是为了等待这一时机的到来而进行的预备斗争。

游击战争通常是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发生的：一是为夺取政权，民众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对统治阶级的猛烈抵抗进行冲击，将斗争推向高潮时；二是夺取政权失败后，民众在遭受统治阶级猛烈追击的情况下，为了准备下一个高潮到

来的时候。

满洲匪团的活动属于后者。在以满洲事变为契机而发生的政权争夺战中遭到失败和挫折的政治匪、共匪，现在正受到满洲国军队的追击。为了创造新的成熟的政治和军事条件，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准备工作。

匪团的武力同满洲军的武力相比，当然不在话下。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游击战争。然而，如果以此为理由而轻视匪团的作用，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匪团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的武力，而在于它的存在本身。因而，如果现在稍微放松对匪团的追击，则将贻害无穷。切记把匪团从地上全部彻底地消灭掉，乃是绝对必要的。

第十一章 三江省地方匪团活动的统计分析

其次，仅就三江省地方匪团作一统计分析。使用的统计数字是根据三江省公署警务厅的《治安月报》刊载的数字。

表一是(见379页)康德二年和康德三年匪首数和匪实有人数的逐月比较表。

表二(见380页)是匪团的出动次数和匪总人数的逐月比较表。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出，从康德三年初开始，三江省地方匪团不论在实有人数方面或者活动方面，显然都扩大和加强了。

以康德二年四月确立情报网为基准，来看指数的逐月变化，这一点就更加明确了。表三(见381页)就是如此。从本表来看，康德二年度的实有匪指数和匪总数的指数都没有大的变化。然而，从康德二年十二月开始出现了增加趋势。及至康德三年二月，则转入稳步而迅速增加的阶段。一般来说，由于季节的影响，匪团的活动有所变化，春天四月份开始活跃，第二、第三季度保持上述状态，进入第四季度则转入萧条。一、二、三月的严寒期间是潜伏期，是最衰落的时期。由此可见，表三的变化显然不是来自季节的影响。其原因可能是下述二点：